

1953 年美英对伊朗的 “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

——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

石 斌

摘 要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危机,是战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美国首次通过秘密“准军事行动”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由于这完全出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与经济需要,有损美国的“民主”形象,因此被刻意隐瞒达半个世纪之久。本文借助新近面世的档案文献,揭示美国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演变过程,尤其是对伊“准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过程。文献证明,美国在伊朗的目标首先是出于冷战地缘战略考虑,防止伊朗为人民党和苏联所控制;其次是扩大美国的影响,追求石油利益,伺机取代英国的传统地位。由于谈判、斡旋、援助、石油禁运、武力威胁等手段均无法遏阻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和石油国有化诉求,美英最终通过隐蔽行动推翻了致力于推进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的摩萨台政府,扶植巴列维王朝复辟,建立了亲美独裁政权。但美英干涉打断了伊朗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是伊斯兰革命后美伊敌对至今的深刻历史根源。

关键词 伊朗 石油危机 “八·一九”事件 准军事行动 美国

一、半个世纪的疑案

伊朗是中东大国,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显著,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

* 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南京 21009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BGJ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危机和 1953 年政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新老帝国权势更替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入中东,战后美英主导地位交替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既是美伊建立长达 20 余年稳定关系的契机,又是双方在 70 年代末交恶并敌对至今的历史根源;这是美国首次通过低成本的秘密“准军事行动”^①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导致了美国冷战策略的重大变化;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意承认的一次干涉行动,因为这完全出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与经济需要,无法用任何意识形态、法理或道德理由来为之辩护,于是被刻意掩瞒,成为近半个世纪的“未解之谜”。

此次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特别是美英联手通过“隐蔽行动”颠覆摩萨台政府的过程,一直是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但人们始终无法了解全部真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的档案材料始终付诸阙如。美英政府一直拒绝公布有关 1953 年政变的档案文件。而且,据信美方大部分文件在 60 年代已被中情局销毁。1989 年,中情局拒绝让美国国务院编纂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刊载有关美国参与政变的关键文献。因此,涵盖这个时段的文件集虽然专门编辑了一个“1951—1954 年伊朗卷”,却没有收录任何有关“倒摩”决策过程和中情局隐蔽活动的文件。^②国务院历史顾问委员会主席孔华润(Warren I. Cohen)因此愤然辞职。^③10 年以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变。1999 年,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兼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依据《信息自由法》向中情局索取据信确实存在的“Wilber 文件”和另一份内部史料,同样被拒绝。中情局以近乎嘲讽的方式回应人们的知情权:仅同意解密“Wilber 文件”中的一句话!^④

这种局面在 2000 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美国参与伊朗政变一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直到 2000 年美国官方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这年 3 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一次有关美伊关系的讲话中说“1953 年,美国在组织策划推翻伊朗颇得人心的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出于战略原因其行为是正当的,但政变对于伊朗的政治发展而言显然是一个倒退。因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何许多伊朗人至今对美国这一干涉其内政的行为仍然心

① 准军事行动(Paramilitary Operation)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的主要子战略之一,是冷战时期美国频繁使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主要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隐蔽行动,包括由中情局等部门对他国秘密进行或暗中组织、训练、协助目标国反政府力量所从事的武装破坏、颠覆政权、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活动。

②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1951—54, Washington, D. C. GPO, 1989.

③ 孔华润 1990 年 2 月辞职。参见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1990, A3; Bruce R. Kuniholm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28, No. 5, May/June 1990, pp. 1, 11—12.

④ 这句话是“总部度过了充满沮丧与绝望的一天”。而之所以同意公布,是因为这句话此前在某个出版物中已被披露。

怀不满。”^①

同年4月,《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发表题为《历史之秘:中情局在伊朗》的特别报道,披露了当时尚未解密的“Wilber 文件”的主要内容。^②该文件即政变行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唐纳德·威尔伯于1954年3月撰写的内部总结报告《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这份后来解密的报告(连同若干附属文件长达200页)是迄今能够见到的有关政变本身最重要的文献。另一份新近解密的较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是由CIA研究人员斯科特·科克执笔的内部历史文件。^③

由于上述原因,2000年以前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只能依据二手材料,最多是靠某些回忆录、口述史料和一些相关但非核心的政府档案文件。

中国学者有关此次伊朗危机的专门论著迄今屈指可数。其中石斌的《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一文,是国内较早专门讨论该问题的论文。此外,范鸿达的论文《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专著《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也有专门论述。王泽壮在200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也涉及该问题。^④这些论著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均未能利用后来出现的一些核心文件,特别是与隐蔽行动有关的文件。

国外学者、尤其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要丰富得多。有关战后以来美伊关系

①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0. 另据报道,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对穆斯林世界的主题演说中也首次承认,“在冷战中,美国曾参与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行动”。

② James Risen, “The C. I. A. in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and June 18, 2000, <http://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mideast/041600iran-cia-index.html>.

③ Donald N.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November 1952—August 195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rch 1954; Scott A. Koch, “Zendeabad, Sha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all of Iranian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Mossadeq, August 1953*, Top Secret Draft History, History Staf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June 1998. 此后陆续公开的还有几份国会和国务院文件。例如: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36/1,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Top Secret Report, Nov. 20, 195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ecord Group (RG) 59, Lot 63D351, NSC, Box 68. 这是杜鲁门政府最后一份对伊政策文件; b. State Department, “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a of NSC 136/1”, Top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20, 1953(来源同前); c. State Department, “Measures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eq”, Top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53, NARA, RG 59, Records of the Officer-in-charge of Iranian Affairs, 1946—1954, Lot 57D529, Box 40; d. State Department, “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ran”, Top Secret Draft Memorandum, August 10, 1953, NARA, RG 59, Policy Planning Staff 1947-53, Box 42, Lot 64D563。

④ 石斌《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范鸿达《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百年潮》,2002年第6期;《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泽壮《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王泽壮《伊朗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上、下),《西亚非洲》,2007年第2—3期。

的综合性论述,有助于了解相关的国际背景。^①其中,巴里·鲁宾的《善意恶果:美国经验与伊朗》是内容最为全面的优秀著作,时间跨度达一个世纪,但重点是 1953 年以后。关于战后初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是布鲁斯·库尼霍尔姆的《近东冷战的起源》,该书论述了大国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冲突。作者认为 1946 年的阿塞拜疆危机是美国涉足伊朗问题的起点。

关于 50 年代初的美国对伊政策,两位著名学者的论著很有代表性。其一是詹姆斯·比尔的《鹰与狮》一书,迄今仍是关于巴列维王朝、尤其 60 年代以来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关于 50 年代初的伊朗危机,作者得出了 15 条结论,主要包括:杜鲁门与艾奇逊不愿采取强硬措施,而艾森豪威尔在杜勒斯兄弟(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等人的支持下则决定直接干涉;隐蔽行动最初由英国提出,而英国说服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强调伊朗有被共产党控制的危险;如果没有伊朗反摩萨台势力的参与,政变不可能成功,但如果没有英美的指导、支持和参与,伊朗人也不会采取行动;人民党的影响力并不大。^②其二是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朗国王》。^③作者在 1987 年即发表了一篇研究 1953 年政变的重要论文。^④在本文中,他进一步探讨了三个问题:美国在政变中的作用、美国干涉的动机和政变对伊朗内政的影响。他认为,尽管英国和一些伊朗人在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美国干涉,摩萨台政权可能不会垮台;美国参与政变的主要目的是抵制苏联扩张,而不是瓜分伊朗石油利益(尽管政变后美国公司获得了 40% 的份额);而政变重新确立了国王的权威,对伊朗内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论著对美国在伊朗和中东的战略目标、对伊政策演变的脉络作了大致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有两个明显缺陷:首先,主要依据二手材料,特别是在 1953 年政变这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核心档案文件的支撑,无法展现具体的决策与实施过程,有些描述也不准确;其次,对相关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揭示不够全面。例如大多数论著都强调美国防范苏联的冷战思维是主要动因,但对于美国控制中东主导权的意图及其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揭示还不够充分,对于美国在中东和伊朗的商业、石油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歧见。

① 比较重要的有:James A.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James Goo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n the Shadow of Musaddiq*,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Mark Lytle, *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53*,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7; Barry Rubin,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关于 40 年代后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包括:Bruce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Louise L'Estrange, *Iran and the Cold War: The Azerbaijan Crisis of 194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James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pp. 92—94。

③ Mark J. Gasiorowski,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④ Mark J. Gasiorowski, "The 1953 Coup D'état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9, No. 3, August 1987。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本代表性的论文集:詹姆斯·比尔等编写的《摩萨台、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一书集中反映了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成果;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等编写的《穆罕默德·摩萨台与 1953 年伊朗政变》一书则反映了上述 CIA 核心文件面世后的研究成果。^①

前一本论文集的基本结论是,在英、伊、美这组三角关系中,存在着三个彼此相关的错误认知,因此无法达成妥协:英国误解了伊朗民族主义的性质,也未能认识到摩萨台代表着伊朗人的希望与抱负。美国过分专注于自身经济利益和中东石油,未能对伊朗民族主义予以充分重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出于冷战思维,混淆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而伊朗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认知也有错误,认为英国是“邪恶的”,而美国是“仁慈的”。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导致了一个致命错误,即以为英美不会联手对付伊朗。

后一本文集的主要内容来自 2000 年和 2002 年分别在德黑兰和牛津大学召开的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后一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美、俄、伊朗等国学者,还包括曾参与策划或实施政变的几位前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外交部官员。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些新材料对危机和政变的国内外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探讨。其中一些新观点值得注意:首先,比过去更加强调伊朗国内因素的作用。有的作者认为,应将 1953 年政变放在伊朗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动荡—专制统治的长期循环”中去考察。有的认为伊朗国内反对力量起了关键作用,甚至暗示,即使没有英美插手,摩萨台与民族阵线很可能也会失败。但也有人指出,防止出现人民党(以及苏联)控制伊朗是美国发动政变的主要理由。尽管人民党尚无力控制伊朗,但美国认为这种危险在不断增长。其次,关于国际因素,比过去更强调英国的作用。有的作者认为英国在政变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英国始终认为摩萨台强烈的反英“情结”最终将使他向共产党靠拢,而美国最初无此“远见”,后来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有的认为由英国带头、英美政府和国际石油巨头联手进行的抵制活动是导致摩萨台下台的重要因素。

这批论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对于摩萨台政权的垮台,西方势力、特别是美英两国通过其情报部门所实施的干涉行动无疑起了直接作用。第二,伊朗国内“范围广泛”的敌对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或是削弱了摩萨台的地位,或是直接促成、参与了政变。这些势力包括扎希迪将军及其支持者、国王及其支持者(摩萨台盟友中的“背叛者”、人民党、民族阵线中的保王派。第三,政变的成功,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上述因素,外加英美情报部门在伊朗长期培植的特务组织,一同起作用的结果。

这些论文给人的印象是,都有意无意地削弱或淡化了外部干涉的作用,将摩萨

^① James A. Bill and Wm. Roger Louis, eds., *Musaddiq,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O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8;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台政权垮台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归咎于国内因素。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否足以改变政变的基本性质(即西方大国通过隐蔽手段颠覆一个国家合法的、并且总的来说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显然大可商榷。而且,除了指出美英冷战战略方面的考虑,对美国取代英国传统地位、主导中东事务的地缘战略意图,美国石油财团的商业利益和美国政府对于石油资源的长远战略价值的关注,大多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总之,这些论著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本文主要研究美国对伊朗危机的反应,考察美国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轨迹和决策过程,揭示美国在伊朗的政策目标,政策演变的内外动因,对伊朗民族主义的态度,以及美国最终取代英国的主导地位与战后世界格局、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宏观背景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重点是利用现有档案文献,特别是上述 CIA 核心文件等新材料,揭示美国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的“TPAJAX”计划^①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二、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1. 战后初期大国在伊朗的角逐

直到 1946 年,英国石油资本仍然控制中东石油产量的 64%。伊朗的石油生产与销售,从 1909 年以来一直为英伊公司所控制。战后以来,伊朗要求维护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伊朗议会提出修改 1933 年租借协定。1947 年 7 月英伊双方签订“补充协定”,但英国仅答应增加一些租让权使用费和税收。

美国石油资本从 20 年代起开始渗入中东。战后初期,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石油财团加紧向中东石油产地渗透。由于伊朗拥有世界最大的阿巴丹炼油厂,因而成为竞争的焦点之一。

苏联在二战期间曾试图获取伊朗北部地区的石油开采权,遭到拒绝。^②二战期间,因为“战时需要”,英美苏三国出兵伊朗。1946 年美英相继撤离。苏联却不提撤军之事,反而支持伊朗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于 1945 年 12 月在苏战区建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人民政府。伊朗为了促使苏联撤军并解决阿塞拜疆问题,曾答应建立伊苏合股石油公司。当伊朗上述目的达到后,美苏已进入“冷战”态势,伊朗议会趁机否决了苏伊协议。苏伊危机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谴责苏联,苏联被迫退却。这是战后第一次伊朗危机,也是美苏在伊朗的首次较量。有研究者

^① “Wilber 文件”显示,这项行动的正式代号并非过去人们所说的 AJAX(埃杰克斯)。TP 是人民党(Tudeh Party)英文的缩写,AJAX 是一种家用清洁剂的名称。因此 TPAJAX 所隐含的意思是在伊朗清除人民党。参见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 331, note 12.

^② Rouhollah K. Ramazani, *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p. 98.

甚至认为阿塞拜疆危机是冷战的开端。^①在冷战背景下,伊朗、希腊、土耳其等“北层国家”(Northern Tier Countries)被西方赋予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战后,70%的石油来自近东,石油对于日欧经济重建也至关重要。^②因此确保西方对近东石油的控制权,与防止苏联控制伊朗具有同等意义。

伊朗在与英苏周旋的同时,积极向美国靠拢。1948年10月,伊朗政府聘请美国顾问参与制定本国建设计划。1949年又宣布取缔人民党(杜德党,Dudeh Party),同时还关闭了苏联驻伊的八个领事馆。伊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的响应。1949年11—12月巴列维国王在应邀访美期间,提出了经援和军援要求。但此时美国外援政策的重点是通过共同防务援助计划提供军事援助。1950年2月10日,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George McGhee)向共同防务援助计划署提交了《1951年财政年度向伊朗提供军援的政治经济因素》备忘录,其中指出,美国在伊朗的政策目标是“防止苏俄控制伊朗和加强伊朗向西方靠拢的趋势”,而苏联的威胁很可能主要是通过人民党从内部进行颠覆。^③因此必须向伊朗提供军援。根据美伊共同防务援助协定,美国决定在1956年以内提供23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④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中东石油产量40%的伊朗地位突显。美英多次就中东和伊朗问题举行磋商。英方强调,伊朗对整个近东战略极端重要,而且“存在着苏联进攻伊朗的危险”。美国则指出保卫伊朗“主要是英国的责任”,敦促英政府尽快缓和英伊矛盾。^⑤这说明到当时为止,美国的中东政策仍然强调英国的作用。

2. “民族阵线”与石油国有化运动

1949年10月,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领导的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民族阵线参加了伊朗第16届议会选举。民族阵线主张石油国有化,在议会选举中提出了反对“补充协定”、“抑制英伊公司特权”的口号。1950年2月,民族阵线八名代表当选为议员。议会随后成立了以摩萨台为首的石油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补充协定”。同年10月,亲英的新任首相拉兹马拉(Ali Razmara)公开支持“补充协定”,遭到摩萨台等议员的坚决反对。

1950年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中东首开先例,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了对半分成的协议。但英国的政策却没有任何松动。1951年1月1日,伊朗议会下院通过石油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否决了“补充协定”。英伊公司随后表示愿按照阿美公司模式重开谈判,但英政府仍坚持租借权有效期至1993年,并要求伊朗接受“补充协定”。3

① 资中筠等《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Ali M. Ansari, *Confronting Ira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 24。

② NIE 14, “Importance of Iranian and Middle East Oil to Western Europe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January 8, 1951, in *FRUS*, 1951, Vol. 5, Washington D. C., GPO, 1982, pp. 270—275。

③ *FRUS*, 1950, Vol. 5, Washington D. C., GPO, 1978, pp. 465—466。

④ 《1950—1952 国际条约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4页;Gasiorowski,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p. 56。

⑤ *FRUS*, 1951, Vol. 5, pp. 268—276, 其中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有一份“伊朗和中东石油对西欧的重要性”的情报评估报告。

月 6 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国有化原则。第二天,拉兹马拉首相被民族阵线另一位重要人物卡萨尼(Ayatollah Abolqasem Kashani)领导的伊斯兰教殉教团成员刺死,亲英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国务院则据此认为,“共产主义分子”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正在利用英伊争端散布反西方情绪。^①

1951 年 3 月 6 日,石油特别委员会通过国有化提案。15 日和 20 日分别得到议会两院的批准,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石油国有化原则。^②4 月 29 日,迫于各种压力,国王决定由摩萨台出任首相。5 月 1 日,国王宣布石油国有化法。

摩萨台上台后第四天即与美国驻伊大使格雷迪(Henry Grady)举行会谈,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的“亲善和帮助”,并对美国的“不干涉态度”表示赞赏。格雷迪大使则建议美国与摩萨台建立合作关系。^③由于摩萨台曾坚决抵制苏联的石油要求,杜鲁门政府此时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反苏和改革代理人,因此把他作为争取对象。

三、杜鲁门政府:从中立到对伊施压

杜鲁门政府对英伊争端的立场,前后经历了从中立、斡旋,到疏远摩萨台并与英国联手施压的变化,但直到杜鲁门离任,美国并未做出直接干涉的决定。

伊朗议会批准国有化提案后,美英曾多次就伊朗问题进行讨论。此时美方表示反对英国采取强硬措施,希望英国服从确保伊朗石油正常进入国际市场和该地区稳定的大局,建议英国接受国有化原则并与伊朗平分利润。^④但英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既得利益,包括武力威胁。5 月下旬,英国宣布向地中海和阿巴丹海面增派舰队和军队。对此,美国国务院称,尽管美国不能支持英国目前的政策,仍会保持“善意中立”。^⑤

美国主要从对苏冷战的角度来考虑伊朗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题为《关于美国对伊朗问题应持何种立场》的研究报告中说“由于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而又无力抵抗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必然被苏联视为其侵略计划中的不变目标。如果伊朗落入苏联手,中东其他国家的独立将受到威胁。”因此首要目标是防止苏联控制伊朗,加强伊朗与西方的联系。^⑥艾奇逊还指示驻伊使馆,在目前形势下,反对国有化会损害美国 and 西方在伊朗的地位,使苏联渔翁得利,但“这一政策不宜对外公开,免得国有化运动受到鼓舞”。^⑦美国国务院在 5 月 18 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同伊朗

①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9.

② *Ibid.*, p. 198.

③ *Ibid.*, pp. 45, 49.

④ *Ibid.*, pp. 32—34, 36.

⑤ *Ibid.*, p. 42.

⑥ *Ibid.*, pp. 11—12.

⑦ *Ibid.*, p. 25.

和英国会谈中的立场》的声明,^①首次公开美国的态度。声明既支持伊朗的国有化立场,又警告伊朗单方面取消合同的严重后果;既奉劝英国承认国有化原则,又声称美国“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英国的任何具体建议。但声明表示,在伊朗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美国石油公司不会在伊朗开展业务。^②

6月20日,伊朗宣布接管英伊公司,正式成立国营石油公司。艾奇逊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等人与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经过磋商,决定派白宫对外政策顾问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作为总统特使赴伊朗斡旋。7月14日,哈里曼一行抵达德黑兰。哈里曼等人告诫摩萨台,要想卖石油就得有销售渠道,中东产油国并非伊朗一家,伊朗必须与英伊公司合作,否则石油公司会联手抵制伊朗。摩萨台最后同意谈判,条件是英国接受国有化原则。^③然而在8月份的谈判中,英方要求在原英伊公司和其他外籍人员控制下成立两个新公司,这实质上是企图复活前英伊公司,谈判很快破裂。

此后美英立场开始接近。1951年11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任首相,艾登为外交大臣。保守党政府决定与美国合作解决伊朗问题。但美方主张维持伊朗现政权的稳定,以免国内分裂给共产党可乘之机,而英方却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代替摩萨台的唯一选择”,也可能有更合适的人上台。^④但美国此时还不想让摩萨台倒台,因为对谁是继任者尚无把握。不过英美都决定支持亲西方的伊朗国王。

由于无法输出石油,进入1952年伊朗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摩萨台向美国要求紧急援助,并声称如不及时援手,人民党将接管政府,或者他只好求助于苏联。^⑤但美国并不认为人民党已有能力直接夺权,此时提供援助不仅得罪英国,还会削弱国王和保守派势力,“从而减少一个更顺从的政府上台的机会”。^⑥这表明美国已经开始考虑摩萨台被取代的可能性了。美国的态度随即转趋强硬。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不能向摩萨台提供贷款,理由是伊朗完全可以靠石油资源获得足够收入。这等于明确告诉伊朗政府,除非同英国达成协议,否则不会得到援助。^⑦

面对这种形势,摩萨台做出了向苏联求援的姿态,伊苏一度加强了经贸往来,与伊朗王室的矛盾因此激化。王室“倒摩”运动随即展开。美国也乐观其成。国务院5月30日给驻伊使馆的指示说得很清楚,如果摩萨台被一个更加反共、更愿意解决石油问题的政府取代,美国将全力支持新政府。^⑧而英国则早已着手物色替代人选,并

①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p. 28—29.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Washington, D. C., GPO, 1957, Vol. 2, pp. 2261—2263.

③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116.

④ 《艾登回忆录(完整的一圈)》(上),武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1—273页;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257.

⑤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328.

⑥ *Ibid.*, p. 330.

⑦ 《艾登回忆录(完整的一圈)》(下),武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6页。

⑧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387.

直接参与了“倒摩”活动。

于是发生了“7 月事件”。7 月 17 日,王室力量扶植盖凡姆(Ahmad Qavam)上台。但摩萨台在议会仍然深孚众望。国有化政策也为民众所支持。盖凡姆上台仅四天就被迫辞职。7 月 22 日,议会表决支持摩萨台复出,随后又授予他全权,批准他兼任国防大臣。亲西方势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7 月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美国对摩萨台的疑虑明显加深。一方面,事件之后美苏互相指责对方在幕后捣鬼。杜鲁门政府内部要求美国负起主要责任的呼声增强。国安会的一份正式文件也指出,“英国显然已不具备单方面确保该地区稳定的能力”。^①但杜鲁门政府经过全面评估,认为摩萨台目前仍然是唯一有能力防止局势迅速恶化的人。^②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英国支持的反对派,摩萨台重新上台后要求议会赋予自己更大的权力。这导致一些重要盟友与之分道扬镳。其中包括在“7 月事件”中对摩萨台复职起了关键作用、并在 8 月份当选为议会主席的卡萨尼。美国方面得知,卡萨尼不仅多次与英国支持的退役将军扎希迪(Fazlollah Zahedi)密谋反对摩萨台,而且还寻求人民党的支持。这个事态使美国感到摩萨台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③

7 月份还有一个重要事态,即伊朗议会民族阵线成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离开伊朗,并要求对美国在巴林岛的石油股份实行国有化。美国认为这是摩萨台政府向左转的标志,^④于是决定与英国联合施压。8 月 30 日,杜鲁门与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如果英伊恢复谈判,且伊朗同意英美的建议,英美将提供资金援助。^⑤但摩萨台拒绝了联合声明。^⑥10 月份,英国与扎希迪合作发动了一次未遂政变。10 月 22 日,伊朗宣布与英国断交。英国势力被正式逐出伊朗,而杜鲁门政府已来日无多,其政策走向因此至关重要。

自 1951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驻伊使馆多次向华盛顿提出警告,认为伊朗形势正在恶化,共产党威胁正在增长。^⑦1952 年 10 月底,驻伊使馆提出长篇报告,对人民党的组织结构、分布状况、与苏联以及摩萨台政府的关系作了全面分析。^⑧其中指出,人民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但影响很大,有一万五千到两万正式党员。该党与苏联联系紧密,许多骨干出席了苏共十九大。苏联正在秘密帮助人民党扩大影响,并已渗

① Robert Lovett, Memorandum to State, Aug. 16, 1952, National Archive, RG 330, Box 16; NSC 136/1, “U. 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Nov. 20, 1952.

② Henderson to Acheson, August 3, 1952, National Archive, RG 84, Box 29.

③ Henderson to Acheson, August 11, 1952, National Archive, RG 84, Box 29; Henderson to Acheson, Sept. 28, 1952, National Archive, RG 84, Box 42.

④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429.

⑤ Ramazani, *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 p. 227.

⑥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p. 476—477.

⑦ Henderson to State, Oct. 22, 1951, Jan. 15, 1952, Nov. 5, 1952, in *FRUS*, 1952—54, Vol. 10, pp. 236—240, 323—327, 513—517.

⑧ Annadel Wile, ed., *Microfiche Collection of 1976 Declassified Documents*. 转引自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九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230—231 页。

透到伊朗政府和军队内部。人民党的策略是争取与民族阵线结成联盟,充分利用形势达到“和平夺取政权”的目的。

这样,报告就将摩萨台政权与人民党和苏联连成了一线,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但国务院指出,民族阵线与人民党有一个根本区别,即反对苏联控制伊朗。共产党在内阁和议会里的影响还不大。人民党仍然是非法的。民族阵线控制的政府与人民党仍然是对立的。除非苏联积极干涉,民族阵线政府(摩萨台或该阵线其他领导人)1953年内仍会在台上,并且会主动防止共产党控制伊朗。^①总之,美国国务院此时还不大相信摩萨台会马上与人民党合流,但并不排除将来有这种可能性,这特别取决于谁有可能替代摩萨台(美国当时估计可能是卡萨尼^②)。因此国务院认为,鉴于形势日益有利于共产党,“美伊关系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支持非共产党政府,使之能继续控制伊朗内政”。^③换言之,不管谁上台,只要不是共产党就行。

11月初,驻伊大使亨德森再次提交长篇报告。他认为,摩萨台虽然不喜欢人民党,也不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主要是为必要时与苏联打交道留下余地。人民党对政府和议会都在秘密施加影响。卡萨尼如果上台,由于地位虚弱很可能求助于人民党。此外,民族阵线的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农场主和商业阶层的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加剧了民族阵线的派系斗争。摩萨台的继任者即使来自民族阵线,也很可能寻求外部支持。^④

11月13日,中情局等部门联合提出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报告认为,民族阵线政府在1953年内还不会下台,摩萨台仍然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以制衡苏联,近期内伊朗发生严重动乱或人民党上台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政治、经济矛盾如进一步恶化可能使政府丧失权威,“至少给人民党逐步控制局面提供机会”。^⑤

基于上述分析,杜鲁门政府于11月20日出台了最后一份国安会对伊政策文件NSC136/1。其中指出,“伊朗形势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目前的趋势如不能得到控制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危险”。^⑥同一天提交国安会的一份报告更明确指出,鉴于目前形势,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防止伊朗为共产主义所控制”。^⑦总之,杜鲁门政府认为形势正日趋严峻,但并未决定直接干涉。

①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p. 509—510.

② Scott A. Koch, “Zendeabad, Sha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all of Iranian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Mossadeq, August 1953*.

③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 510.

④ *Ibid.*, pp. 514—517.

⑤ CIA, “Probable Development in Iran through 1953”,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IE) 75, Nov. 13, 1952. 该报告修订版 NIE75/1 (Jan. 9, 1953) 见: <http://www.foia.cia.gov/browse-docs.asp?doc-no=0000010479>.

⑥ NSC 136/1,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⑦ James S. Lay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SC), “A Report to the NSC on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November 20, 1952, Declassifies Reference System, 1980, Document No. 376C.

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干涉政策的形成

1953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即着手调整国家安全战略,随后出台的“新面貌”战略,以所谓“大平衡”为原则,试图兼顾“安全”与“繁荣”两大目标。为此一方面继续推行遏制战略,另一方面又在策略上做出一些调整,其中包括更加倚重军事、政治和经济代价都较为低廉的隐蔽行动。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即开始策划在中近东建立一个“微型北约组织”,该组织连同“北约”和次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构成一条围堵苏联的防线。伊朗、土耳其和阿富汗这一所谓“北层政治区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控制伊朗对于遏阻苏联南下和维护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

在新战略的酝酿过程中,如何处理伊朗问题,恰好是一块试金石。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立即指示中情局调查摩萨台是否有可能“与人民党—俄国结成一伙”。^①一些留任的 CIA 官员,此时都竭力主张通过政变搞掉摩萨台,其中包括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从中情局副局长升为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前中情局负责人、现为副国务卿的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现为中情局隐蔽行动部门负责人的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ener)。^②

已经两年没有石油收入的伊朗,通货膨胀剧烈,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53 年初,摩萨台为巩固政权,采取了诸如延长戒严令、夺取军事任命权、取消上院、解散下院等强硬措施,引起了部分支持者的不满。以摩萨台为首的民族主义力量与国王为首的亲西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1953 年 2 月,在德黑兰发生了保王派与亲摩萨台派的武装冲突,摩萨台及时采取措施巩固了地位。苏联趁机作出改善苏伊关系的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摩萨台与其在民族阵线的支持者关系破裂,这就使得人民党看上去成了摩萨台唯一可能的支持者。^③

中情局据此向政府报告,摩萨台“日益与人民党密切结盟,甚至通过人民党与苏联结盟”,^④建议放弃摩萨台。同时美国也看到,在民族主义浪潮下摩萨台的妥协余地实际上非常有限。正如杜勒斯在国安会会议上所言,摩萨台“无法与英国达成任何协议,唯恐因此葬送其政治生命”。^⑤因此美国感到不能再指望英国,而应考虑直接承担责任。

美英为了打破僵局,于 2 月 20 日向伊朗提出一个联合建议,核心内容是伊朗对

① Kermit Roosevelt, *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15.

② Gasiorowsky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p. 223—224.

③ *Ibid.*, p. 225.

④ Kermit Roosevelt, *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 p. 117.

⑤ “Discussion at the 132nd Meeting of the NSC on February 18, 1953”, Ann Whitman File, Eisenhower Papers, Eisenhower Library.

英伊公司支付赔偿,并通过美英销售组织向外销售伊朗石油。^①英国将这次建议视为最后条件,实际上并不指望达成协议。而美国已无意要求英国做更多让步,却有意通过国际销售组织直接插手伊朗石油。3月20日摩萨台拒绝了联合建议,最后一轮谈判破裂。

3月初艾登访美时,英美立场已相当一致,区别在于英国忧虑的是英伊公司落入伊朗之手,美国担心的则是伊朗落入苏联之手。鉴于伊朗的战略价值,美方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另起炉灶,因此还想安抚摩萨台,包括提供援助或派技术人员去阿巴丹炼油厂。后一想法自然遭到英国反对。美国随后又提议由美国公司收购英伊公司。这显然又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策略,被英方断然拒绝。^②但美国仍采取了一些援助措施。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重新评估伊朗局势。3月初,国务院已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认为摩萨台已难以继续掌权,国王束手无策,军队根本靠不住,出路十分渺茫。^③从杜勒斯3月2日给驻伊使馆的信中可以看出,国务院与驻伊使馆一致认为,人民党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国王,为此正与摩萨台合作,估计搞掉国王后,人民党会转而除掉摩萨台,这样共产党上台的机会很大。^④国务院在4月8日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文件中也指出,如果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即使共产党不上台,西方也可能会失去伊朗。^⑤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必须推翻摩萨台政权。

1953年5月中旬,为了推销中东防务组织计划,杜勒斯与共同安全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等人访问了中近东12国,却没去伊朗。6月1日杜勒斯就访问发表演说。他首先强调,近东具有巨大的战略与经济意义,而苏联早已“垂涎欲滴”;然后介绍了近东诸国的形势,特别是各国“对共产党侵略和颠覆意图”的态度;最后透露了建立中近东“北层”军事集团的打算。^⑥同一天的国安会会议也得出结论“北层国家”可以构成抵御苏联的天然防御带,而伊朗事关防务组织计划的成败,必须全力保住。^⑦

5月28日,摩萨台再次请求美国援助。艾森豪威尔直到7月份才答复并明确拒绝。^⑧实际上,遑论援助,早在3月中下旬最后一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已决定搞掉摩萨台,并于6月下旬正式批准了行动方案。

① 《艾奇逊回忆录》(下),伍协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584页。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 in Teheran, Jan. 26, 1953, 888.2553/1—1653, National Archive, RG59, Washington, D. C.; Jernegan's Memorandum to Dulles "The Iranian Oil Situation", Feb. 28, 1953, 888.2553/2—2835, National Archive, RG59.

② Tore Peterse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Great Power*, Houndmills: Macmillan, 2000, pp.21—22.

③ Gasiorowsky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225.

④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691.

⑤ Briefing Paper for the President, April 8, 1953, 888.2553/4—853, National Archive, RG 59,

⑥ 《杜勒斯言论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3—62页。

⑦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47th Meeting of the NSC, June 1, 1953, in *FRUS*, 1952—54, Vol. 9, part 1, pp.379—386.

⑧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93—194页。

五、“TPAJAX 计划”与“八·一九”事件

1. 美国的决策

早在 40 年代后期,成立不久的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在伊朗从事旨在消除苏联影响和反对人民党的隐蔽活动。1948 年 6 月,作为对布拉格事件和柏林封锁的反应,杜鲁门签署了 NSC10/2 号文件,要求加强美国海外隐蔽活动的能力。中情局随后制订了代号为“TPBEDAWN”的行动计划,目标是摧毁苏联在伊朗的影响,每年投入资金 50—100 万美元,约占中情局 8200 万美元隐蔽行动预算的 1%。为此所建立的情报网络为“倒摩”政变打下了基础。CIA 还将伊朗人贾拉利(Ali Jalali) 和卡瓦利(Faruq Kayvani) 培养成为各种活动的重要组织协调者。他们在“倒摩”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 年 11 月杜鲁门签署的最后一份对伊政策文件,授权有关部门“在共产党试图夺权或实际掌权的情况下”,采取军事、政治等各种手段以及“特别”行动,并且指出:如果人民党政变成功,美国的目标是“推翻共产党政府”;如果苏联直接进攻伊朗,美国将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是否将该行动作为开战理由。^①这份文件表明,在杜鲁门执政后期,美国对伊政策已发生显著变化,即决心承担更多责任,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全力防止伊朗倒向苏联阵营,为此决心在发生共党政变或苏联入侵时,不惜使用武力甚至诉诸战争。

不过,尽管同月英国已正式提议联手发动政变,杜鲁门政府并未打算采取此类极端措施,因为尚无可靠替代人选。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随着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加上 1953 年 2—3 月间伊朗出现的几项关键事态,美国的立场才发生根本转变,即认为应该在人民党或苏联发难之前“先发制人”。

英美情报机构则早已开始酝酿“倒摩”计划。政变计划最初由英方提出,而且有关设想来自英国政府内部,而不是英伊石油公司。^②一直在伊朗境内活动的英国情报人员认为,只要政府出钱支持伊朗反摩萨台势力,就可以取得成功。英国在伊朗秘密培植的代理人是伊朗人拉什迪安兄弟(the Rashidians)。自摩萨台任首相以来,英国已多次试图搞垮他。由于一再失败,且英伊断交,英方活动受到限制,只好求助于美国。

1952 年底到 1953 年初,英美情报人员曾多次密商此事,并就各自在伊情报网络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交换意见。1952 年 11 月,英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 Woodhouse) 和外交部官员萨姆·法勒(Sam Falle) 在华盛顿与中情局官员会晤,并相继会见了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中情局副

① “U. 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

② James A. Bill and Wm. Roger Louis, eds., *Musaddiq,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Oil*, p. 8.

局长杜勒斯、隐蔽行动负责人威斯纳等。其间,美方表示共和党政府上台后可能会考虑英国的计划,双方还一致认为亲西方的扎希迪是取代摩萨台的最佳人选。

1953 年冬春之交,摩萨台退出谈判,拒绝英美联合建议,卡萨尼等重要人物进一步倒向反对阵营。至少发生了两次具有政变性质的活动。2 月下旬,卡萨尼与其他反对派组织人群攻击了摩萨台的住宅,并与摩萨台的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4 月下旬,扎希迪的盟友绑架并杀害了摩萨台的警察负责人。尽管人民党并未积极介入这些活动,但在美国看来,由于民族阵线内部分裂,摩萨台将不得不依靠人民党来动员群众支持自己。

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几周,杜勒斯兄弟曾多次讨论英国的建议。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弗兰克·威斯纳,西奥多·罗斯福之孙、中情局中东地区隐蔽行动负责人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等都积极主张发动政变。艾森豪威尔上任后,伍德豪斯和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又与美国官员在华盛顿多次会谈。大约 2 月中下旬,在与杜勒斯兄弟、罗斯福、史密斯等人的一次会晤中,国务卿杜勒斯非正式地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议,并让罗斯福负责这项代号为“TPAJAX”(清除杜德党)的政变计划。艾森豪威尔此时还在犹豫。3 月中下旬,最后一轮谈判破裂,摩萨台又正式拒绝英美联合建议,且英国要求美国不要提供援助,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与英国联手,并授权 CIA 开始制订计划。4 月 4 日,CIA 德黑兰站获得 100 万美元活动经费,以便“用任何方式使摩萨台台”^①。

2. 政变方案的设计

中情局在 4 月 16 日即提出了关于政变可行性的初步报告,并决定与英国情报部门(SIS/MI6)合作。5 月中旬,中情局心理战专家唐纳德·韦伯与英国伊朗情报站负责人诺曼·达比希尔(Norman Darbyshire)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会晤,共同起草计划草案。^②6 月 17 日两人回到华盛顿后,根据各自总部的意见完成了计划的定稿。^③

“TPAJAX”计划主要包含两手:其一是合法或准合法途径,设法逼迫摩萨台辞职或议会投票解除其职务,由扎希迪取而代之;其二是军事颠覆。具体分为六个步骤:首先是舆论宣传。在政变前开展舆论攻势,由 CIA 德黑兰站负责组织进行,预算为 15 万美元,目的是“制造、扩展和提升公众对摩萨台及其政府的敌对、不信任和恐惧情绪”。宣传主题包括:摩萨台支持人民党并且反伊斯兰;他有意摧毁军队士气,搞垮伊朗经济;鼓励地方分裂主义,为苏联入侵大开方便之门;甚至与人民党达成秘密

^① Donald N.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November 1952—August 1953*, pp. iv, 2—3;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 232.

^②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p. iv, 3, 5, E5.

^③ 关于政变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2000 年披露的“Wilber 文件”(包括 5 份附属文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翔实可靠的记录。但仍有许多细节由于相关文件被销毁可能永远无法厘清。参见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p. 227—260, 339, note 72.

协议,让其帮助自己反对宗教领袖、军队和警察;等等。^①第二,军事准备。英美提供经费(在已经提供的6万美元基础上,CIA再追加7.5万美元),让扎希迪组织军队反对力量,做好军事行动准备,政变时负责逮捕摩萨台及其合作者以及人民党骨干,控制国内重要机构。^②第三,争取国王的支持。途径包括让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Ashraf Pahlavi)去说服国王支持政变并同意扎希迪上台。美军退役将领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等国王比较信任的人也将参与说服工作,争取让国王签署命令任命扎希迪为军队首脑。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并未打算让国王签署命令解除摩萨台职务并任命扎希迪,原因是国王极其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政变期间拟让国王离开伊朗也出于同样考虑。^③第四,使议会通过“准合法”的投票程序解除摩萨台的职务。策略是组织暴徒攻击宗教领导人并嫁祸于摩萨台,然后让被收买的议员投票解除摩萨台的职务,并任命扎希迪为首相。此后国王方可回国批准议会的行动。第五,组织反摩萨台示威游行。在“政变日”上午,由美英在伊朗社会各界培植的亲信或代理人出面组织大规模游行,推动议会投票。同时,扎希迪的军队势力设法阻止人民党或亲摩萨台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最后,如果议会的行动失败,就由扎希迪的军队武力夺权。^④政变的预算是28.5万美元,其中美英分别负担14.75万美元和13.75万美元,这还不包括用来收买议员的费用(自5月20日起每周提供1.7万美元)。^⑤

1953年6月25日上午,“对伊行动方针”(TPAJAX计划)的高层决策会议在国务卿办公室举行。会议由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主持。与会者有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前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罗伯特·鲍伊,国务院高级官员、“秘密战”专家罗伯特·墨菲、驻伊大使亨德森等。国务卿杜勒斯首先指出,伊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大国竞争的对象。“自始至终参加竞争的有俄国,经常参加的有法国和德国,现在参加的还有英国及其合作者美国。”伊朗是美苏必争之地,“如果俄国人控制了伊朗,就会控制波斯湾。这是俄国人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梦想和野心”。^⑥接着由克米特·罗斯福介绍“TPAJAX”计划。具体实施以美国为主,英国予以配合。与会者相继表态,认为应该动手,并且“非做不可”。^⑦

7月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长艾登批准政变计划。1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正式批准。^⑧

①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p. iv, 3, 5, E5, pp. B15—B24.

② *Ibid.*, pp. B2, B11—B18.

③ *Ibid.*, pp. 18, B3—10.

④ *Ibid.*, pp. 8—11, A1—A8, B2, B13—B25.

⑤ *Ibid.*, pp. 18—19, B1.

⑥ Kermit Roosevelt, *Countercoup: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Iran*, p. 10.

⑦ *Ibid.*, pp. 17—18.

⑧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 18.

3. 政变的实施

该计划由克米特·罗斯福具体负责执行。罗斯福是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老手。军队力量的组织以及舆论攻势的进展比较顺利,较为麻烦的是争取国王的支持。这不仅是因为国王性格软弱,还因为他一直反对扎希迪出任首相。

7月16日,美国情报人员在法国东南部旅游胜地里维埃拉秘密会见了巴列维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在得到一大笔钱后,公主答应回国传达美英的意图,并于29日见到了国王。^①曾为国王训练过警察部队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其子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的总指挥)也奉命赴伊充当说客。

8月初,摩萨台宣布解散议会,通过议会投票解除摩萨台职务的企图顿时落空。CIA不得不改变策略,要求国王签发两份命令,分别解除摩萨台的职务,同时任命扎希迪。罗斯福亲自出马向国王施压,支持政变的伊朗军官等也前去给国王打气。在轮番夹攻之下,8月12日,国王终于在事先拟好的两份手谕上签字。^②与此同时,“心理战”也进入高潮。反对势力控制的媒体齐声讨伐摩萨台。中情局特务还冒充支持摩萨台的人民党人,以爆炸行动等方式恐吓宗教界人士。^③

原计划8月14日晚由国王卫队长纳赛利(Ne'matallah Nasiri)去传达第一道手谕,并逮捕摩萨台及其亲信。不知何故,扎希迪等决定将行动推迟到15日晚,而摩萨台至少在14日或15日已获悉政变阴谋。由于摩萨台早有准备,15日深夜,纳赛利在向摩萨台传达手谕时被捕。16日上午,摩萨台政府对外宣布粉碎政变。支持摩萨台的军队控制了整个德黑兰。一度被亲扎希迪武装力量逮捕的几位内阁成员被释放。反摩萨台的军事力量开始瓦解,头目纷纷逃逸或隐藏。^④18日,总部通知罗斯福放弃政变企图并与扎希迪等一同撤离。

但CIA行动小组与扎希迪及其同伙并未死心。罗斯福与扎希迪决定通过国外媒体公布国王手谕,并在伊朗散发有关信息,以图扭转形势。CIA还让已逃往巴格达的国王按指定口径发表广播讲话,并在伊朗国内和中东地区发动舆论攻势,驻伊美国军事顾问团则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军队支持国王。17日上午,CIA通过贾拉利和卡瓦利雇佣了一群暴徒,冒充人民党人在德黑兰街头进行打砸抢活动。他们摧毁国王塑像和画像,冲击礼萨国王陵墓,破坏清真寺,甚至攻击美国人。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党人和普通民众随后加入,摩萨台的支持者也走上街头,各路人马彼此还发生了冲突。人民党喊出了结束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德黑兰很快陷入混乱。

由于CIA此前采取了公布国王手谕等一系列措施,由17日延续至18日的混乱状况给摩萨台的声誉和地位造成了严重打击。许多民众和军人认为摩萨台已无法控制局势,因此在19日的政变过程中不再支持他,甚至加入反对阵营。由于美国大

①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p. 22—32.

② *Ibid.*, pp. 33—38.

③ *Ibid.*, p. 18.

④ *Ibid.*, pp. 39—45.

使亨德森要求摩萨台加强对美国人的保护,摩萨台于是命令原本呆在驻地的警察部队前去驱散冒充人民党人的暴徒,这不仅导致部分警察加入了反对阵营,而且在弹压暴徒的过程中,真正的人民党奉命撤走。此外,摩萨台不仅公开谴责闹事者,还要求民族阵线领导人不要组织示威活动。因此,在 19 日这天,由于人民党人和摩萨台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没有上街,形势出现戏剧性转折,变得对摩萨台极为不利。^①按照第一次逮捕行动失败后商定的计划,CIA 行动小组将在 19 日再次发起攻势。其中除了在德黑兰以外争取援军,还包括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号召军队与民众“支持宗教和国王”。

8 月 19 日上午,德黑兰南部集市上逐渐聚集了一支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当围观人群越来越多时,游行队伍突然高呼“国王万岁”、“打倒摩萨台”等口号。混在其中的 CIA 雇员竭力挑唆和怂恿示威者攻占德黑兰电台,并说服警察部队和围观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政变支持者领导的部分军队随后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德黑兰的主要广场很快被国王的支持者所控制。^②

反摩萨台力量与支持他的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持续了整个下午。临近傍晚,政变一方控制了主要政府机构和电台、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并利用所控制的通讯、宣传手段向其他城市发布信息,鼓励各地民众支持政变。一度躲藏的扎希迪也在德黑兰电台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才是合法总理,且德黑兰已为其支持者所控制。

当天下午,CIA 收买的军队将领率领部分皇家卫队成员围攻了摩萨台的住宅。双方都出动了坦克,经过两小时激战,死伤数百人,结果摩萨台的军队被打败,财产被洗劫一空,住宅被烧毁。摩萨台本人从房顶逃走,但第二天被迫向扎希迪的军队投降。^③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被政变力量所控制。^④8 月 22 日,国王回到伊朗。第二天在王宫与罗斯福举行了庆祝宴会。此后数月内,扎希迪大肆逮捕民族阵线成员和人民党人,使这两个组织几乎瘫痪,其幸存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六、美英围绕石油利益分配的斗争

1953 年 8 月 20 日扎希迪上台,两天后 CIA 就秘密为其提供了 500 万美元现金。^⑤9 月 3 日,美国在“第四点计划”名下向伊朗提供 2300 万美元的援助。9 月 5

①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p. 53—64.

② *Ibid.*, pp. 56—73.

③ 摩萨台本人对被捕过程的简要叙述,见 Mohammad Mosaddeq, *Musaddiq's Memoirs*, Homa Katouzian, ed., London: Jebhe, 1988, p. 286, note 2。1953 年 12 月,摩萨台以叛国罪被判处三年监禁,出狱后被继续软禁,直至 1967 年去世。关于审判过程,详见 Homa Katouzian, *Musaddiq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Iran*, London: I. B. Tauris, 1990, pp. 194—207。

④ Wilber, *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 pp. 61—73.

⑤ *Ibid.*, p. 5.

日,又宣布增加 4500 万美元紧急赠款。1953 年度援伊总额达 8500 万美元。

但外援终究有限,伊朗经济的恢复乃至新政府的前途,还得依靠石油收入。领头搞一个解决方案,已非华盛顿莫属。国务院原想成立一个全美公司来直接收购英伊公司,引起英政府的警惕,最后决定建立一个国际财团。^①

9 月初,国务院召集美国各大公司会商,要求它们积极参与,“为国家利益服务”。由于当时世界石油业面临生产过剩的问题,美国大公司最初似乎热情不高。其实石油巨头们自有盘算。他们要求得到保证:美国公司进入伊朗不会影响全球石油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而且政府必须设法使他们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②实际上,石油利益集团为了进入伊朗,一直在给政府施加压力。^③1952 年底艾奇逊在与美国石油公司代表会谈时就承认,尽快解决伊朗危机,不仅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也是因为国务院正面临国会的巨大压力,而这正是想进入伊朗的石油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④艾森豪威尔亲自与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 Jr.) 交涉,认为“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应服从国家利益”,要求网开一面。^⑤1954 年 1 月底,布劳内尔作出裁决,美国石油公司可以参加外国公司生产、提炼和获取伊朗石油,从而扫清了法律障碍。

英国被迫接受国际财团计划,但要求拥有 50% 以上股份,被美方断然拒绝。美国公司最初想占有 75% 的股份,而美国国务院也以英伊公司占主导地位必将引起伊朗民族主义和人民党的反弹为由加以反对。^⑥美方多次以退出谈判相要挟,英国被迫让步,结果决定美英各占 40%。其余 20% 留给英荷壳牌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⑦

英国还要求财团其他成员补偿英伊公司因失去独占地位将损失的 60% 的利润,同时要求伊朗赔偿国有化期间给英伊公司造成的损失。前者要求 1.267 万亿美元(按未来 20 年计)现款;后者要求 1.1 亿吨免费石油(20 年内),约值 1.463 万亿美元。^⑧但美国公司仅同意以 10 亿美元作为参与代价,对免费石油的要求则坚决反对。^⑨华盛顿也奉劝英国采取“更现实、灵活的态度”。杜勒斯宣称,英伊公司已经一无所有,“如不改改调子”,仍将一无所有,而且美国将重新考虑它在伊朗和中东的政

① in *FRUS*, 1952—54, Vol. 10, Iran, pp. 815—819. 详见石斌《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

② *Ibid.*, pp. 852—854.

③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pp. 80—83.

④ Wilkinson Memorandum “Iran”, Dec., 12, 1952, in FO 371/98668/EP1532/431. 转引自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 325, note 54.

⑤ Anthon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N. Y.: The Viking Press, 1975, p. 129; Robert Schulzing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42.

⑥ Henderson to Dulles, Nov., 6, 1953, 888.2553/11—2453, National Archive, RG 59; Hoover to Dulles, Jan., 28, 1954, 888.2553/1—2854, National Archive, RG 59.

⑦ *FRUS*, 1952—54, Vol. 10, pp. 926—928.

⑧ *Ibid.*, pp. 949—950.

⑨ *Ibid.*, pp. 950—953.

策,甚至采取单独行动。^①英国最后提出 2.8 亿美元的要求,美方提出 500 万美元。^②

国际财团与伊朗政府的谈判也几经周折。5 月 12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对伊朗和英国施行“高压”,务求尽快解决。7 月 26 日,英国与伊朗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结果是 7000 万美元的赔偿。9 月 19 日,国际财团与伊朗政府签订协议,规定石油资产原则上为伊朗国有,但由国际财团来管理生产和销售,利润平分;国际财团拥有伊朗西部和南部 25.4 万平方公里领土石油专营权,期限 40 年。10 月 29 日,伊朗国际石油财团正式成立。

几个月后,美国政府以国内政治和反托拉斯法方面的考虑为由,建议每个美国公司让出 1% 给一个由另外九个独立公司组成的新实体。英国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结果任何美国独立公司均可参加“小财团”。

伊朗石油问题的解决方式,被美国国务卿的石油特别顾问小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Jr.)称为史上“最大的商业交易”。^③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都如愿以偿:建立了亲美政府,插足了伊朗石油。石油大王纳尔逊·洛克菲勒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也坦言:“我们终于能够取得伊朗石油……在伊朗经济地位的加强使我们能够控制它的整个对外政策。”^④

七、结论:若干问题的厘清

仅就美英“准军事行动”所促成的“八·一九”政变而言,其直接后果与长远影响都是明显和多方面的。

其一,就伊朗国内政治而言,它打断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潮流和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一个独裁政权。在许多伊朗人看来,摩萨台的某些做法虽然不无争议,但他对外反对大国干涉、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对内始终致力于推进宪政,反对王权专制,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值得肯定。政变发生时,摩萨台政权已有所动摇,因此有人认为即便没有大国干涉,摩萨台也可能垮台。然而这只是推测,而干涉却是事实。何况西方势力一直在秘密活动,干涉并不限于政变那几天。这直接导致、而不只是加速了摩萨台的垮台,更是对伊朗主权的公然践踏。伊朗国王却因此进一步投靠美国,并重新凌驾于议会和政府之上,逐渐确立了事实上的专制体制,直至 1979 年伊朗革命。

其二,政变对美国在伊朗的地位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伊朗国王“个人的利益与美国石油官员和外交官们的利益暂时不谋而合”,^⑤美国得以取代英国成为影响伊朗事务的主要外部力量;但另一方面,政变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许多伊

① Dulles to American Embassy, London, March 17, 1954, 888.2553/3—1754, National Archive, RG 59.

② *FRUS*, 1952—54, Vol. 10, pp.958—959, 968—969.

③ *Ibid.*, p. 1012.

④ 《中东问题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第 369 页。

⑤ Robert D. Schulzing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20th Century*, p. 242.

朗人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化身,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为了自身利益先是推翻了一个合法并得到中下层民众广泛支持的政府,继而成为一个专制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这些都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 1979 年伊朗革命政权的反美立场,美伊继而因人质事件断交,形成延续至今的敌对关系。

其三,政变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声誉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使美国维护中东国家政治独立的姿态显得空洞和虚伪。例如,埃及总统纳塞尔原本有意与美国商讨一些共同安全议题,但鉴于伊朗的教训,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他决心不受英美的摆布。

其四,政变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冷战策略。杜鲁门政府在苏东和远东地区的隐蔽行动成效甚微,艾森豪威尔政府却首次实现了颠覆一个外国政权的目的,以较小的代价保住了伊朗这个重要冷战“资产”(据说总共只花了 70 万美元^①)。这使得决策当局将政变视为一个成功范例,^②认为可以在其他地区如法炮制,于是更加频繁地采取“隐蔽行动”,危地马拉(1954)、叙利亚(1958)以及“猪湾入侵”(1961)便是其中一些突出例子。仅到 50 年代中期为止,CIA 就进行了 50 次隐蔽活动,所用经费占其总预算的 80%。此后几乎历届政府都曾使用类似行动来支持海外盟友、反对不友好政权,隐蔽行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③

此外,我们知道,当今美国所拥有的首屈一指的世界地位,尽管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却是在冷战时期最终确立的。美国对伊朗危机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手段、后果及其内外动因的典型实例。从整个危机过程来看,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此次伊朗危机,正式引发了美英中东主导地位的交替过程(这种交替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达到高潮)。西方大国在战后要继续维持其政治经济利益,必须应付中东产油国民族主义政权上台后,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首先是与西方国家关系)所带来的“不稳定”局面。在这场变革秩序与维持秩序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逐渐取代英国,负起维护西方经济与战略利益的领导责任。新旧帝国“换岗”,是战后美英国际地位的兴衰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更替和利益再分配的必然结果。

其次,从决策过程看,美国当局始终在“冷战”理念支配之下,以遏制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为战略出发点,在伊朗的目标是力图维持或培植一个亲西方政府,使之成为在中东对抗苏联的据点。美国最初的中立是因为看到摩萨台对苏联并无好

① Anthony Sampson, *The Seven Sisters*, p. 12.

② Gasiorowsky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p. xiv-xv.

③ 1954 年国会的一项指令概括了隐蔽行动的类型:宣传;政治行动;潜逃、躲避与疏散措施;颠覆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自由世界”受威胁国家的反共分子;欺骗性计划与行动;以及有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所有其他活动(John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1982, p. 158)。到 70 年代,暗杀手段也被明确纳入。后来还包括各种高技术信息战。

感,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对象。由于英国始终不肯放弃既得利益,伊朗民族主义政权则决心将国有化进行到底,危机久拖不决。随着伊朗政局日益不稳,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最终使美国站到了英国一边,并负起主要责任。

第三,美国在伊朗和中东也有其经济目标。早在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内部就有人强烈反对美国插手中东石油,认为“应该拒绝与美国人平分这最后的遗产”。^①美国政府虽然强调“政治挂帅”、冷战优先,但并未忽视伊朗石油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商人“无利不起早”,石油巨头们最初貌似热情不高、甚至“不讲政治”,但一俟时机成熟,便很快进入角色。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和石油大亨们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英伊矛盾,从中渔利,这在危机后期尤其是国际财团谈判过程中表露无遗。战后英美争夺中东石油的斗争,是国际垄断资本瓜分石油资源的典型例子。国际石油市场参与结构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美国公司能够大规模地进入中东产油国,直接背景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

第四,“八·一九”政变(确切地说政变发生在 15—19 日之间)之所以发生并取得成功,固然由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英政府和英国在伊朗的情报系统的大力协助、扎希迪等亲西方伊朗人的积极配合、国王的支持、摩萨台及其民族阵线盟友以及人民党在政变期间的一些策略失误,但美国政府和 CIA 秘密行动系统在整个事件中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在政变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英国的作用虽然不可忽视,但本质上不过是配角;扎希迪、贾拉利、卡瓦利、拉什迪安兄弟等伊朗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美英(主要是美国)精心挑选、长期资助或暗中培养的;国王的支持也是美国软硬兼施、多方游说的结果;议会和军队中的反对派有许多人是被美国收买的。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插手,并无任何组织或个人能够对摩萨台政权构成致命威胁。政变前英国人已被赶走,亲英分子已经失势,卡萨尼在议会中已失去大部分支持,“倒摩”已失败两次的扎希迪因被通缉早已不敢露面,军队中忠于摩萨台的人仍占多数。^②因此,过分强调伊朗国内因素,认为美国只是“鼓励和帮助”了摩萨台的反对者、对政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③这种避重就轻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第五,从美国对伊朗民族主义的反应,还可以看出,美国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由其战略需要决定的。由于苏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对伊朗的石油要求以及对阿塞拜疆问题的介入,使伊朗民族主义对它抱有敌意,因此美国最初并未把伊朗民族主义视为对西方的严重威胁。只有当它认为民族主义可能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甚至有可能与之结成哪怕是暂时的联盟时,才加以反对。危机后期美国态度的转变,除了担心伊朗局势不稳导致苏联乘虚而入,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摩萨台不仅难以为美国所控制,而且有可能通过人民党与苏联挂上钩,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中东战略。

①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p. 168.

② Mark Gasiorowski,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p. 80.

③ 参见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p. 274—276.

然而,关于摩萨台与共产党关系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冷战逻辑的主观推断。事实上,摩萨台政权与人民党的关系很不融洽。摩萨台仍然视人民党为非法政党,并曾镇压人民党支持的示威活动,而人民党对摩萨台接近美国也非常不满。摩萨台与人民党最多不过是一种为各自目的必要时互相利用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对立的。^①美国有关部门还明显夸大了人民党的力量 and 影响。许多学者通过对伊朗和前苏联档案文献以及 CIA 的行动记录等材料的研究,发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党在危机期间试图控制国家权力的看法并无依据。实际上,人民党领导层在是否支持摩萨台和民族阵线等许多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八·一九”政变后获得的人民党文件也显示,该党实际上已决定不采取诸如政变等干涉行动,因为苏联认为伊朗国内形势尚不成熟。一位当时负责跟踪研究伊朗共产党的 CIA 分析人士也指出,人民党在政治上尚未做好准备,因此并不打算与实力远为强大的摩萨台或民族阵线争夺权力。此外,CIA 对于人民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在伊朗的意图实际上知之甚少,CIA 的秘密行动部门可能是为了推动美英采取政变行动而故意制造有关人民党力量的“错误印象”。^②

苏联在危机期间也没有多大作为。摩萨台一度与苏联往来,不过是为了向西方施压的一种姿态。1953 年正值斯大林去世,苏联本身忙于政权交接,自顾不暇。而作为伊斯兰化的国家,外加历史原因,伊朗对苏共本来就有强烈的戒备心理,苏联即使有所图谋也难有成效。

总之,美国的政策设计者们对共产主义外来扩张、内部颠覆的夸张,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冷战”观念支配下(加之国内麦卡锡主义和“红色恐怖”气氛)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和过分恐惧;其二,与民主、人权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与道义旗帜一样,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也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不仅有利于取得国内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也便于压服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英国。^③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摩萨台主张宪政,致力于建立一个世俗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摩萨台政府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而美英却充当了一个专制体制的催生者和长期支持者。无怪美国政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愿承认为了自身利益而推翻一个民选政府、打断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事实。因为这对于在国际道义上自视甚高的美国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对于一些西方大国动辄以促进民主与人权、捍卫国际法准则、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谋取自身战略与经济利益的行为,也不啻是一种嘲讽。

(责任编辑:李 丹)

① 政变期间,摩萨台还下令销毁了人民党散发的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传单,目的是想避免此事成为政变的借口。见 Mohammad Mosaddeq, *Musaddiq's Memoirs*, p. 285.

② Gasiorowski and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pp. 220—221.

③ 例如杜勒斯后来就承认,政府有时刻意夸大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因为这有助于在国际上维持盟国的团结,在国内使一些强硬政策获得支持。参见 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102—103, 143—145.